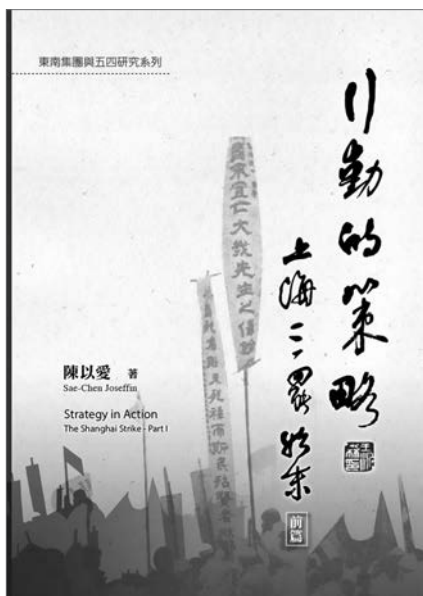


上海的五四運動

——評陳以愛《行動的策略：上海三罷始末（前篇）》

● 趙 帥



陳以愛：《行動的策略：上海三罷始末（前篇）》（香港：開源書局出版有限公司；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5）。

1925年，北京大學學者陶孟和撰文〈現代教育界的特色〉，宣稱五四運動前後教育界的嬗變秘

辛「是要到二〇二五年才可以發表——假使當時的狀況允許——的一部著作裏的幾節」^①。巧合的是，2025年，台灣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陳以愛「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的第二部《行動的策略：上海三罷始末（前篇）》（以下簡稱《行動的策略》，引用只註頁碼）問世。其首部曲《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以下簡稱《動員的力量》）探討「東南集團」（下詳）的人際網絡及動員方式，以呈現五四期間上海學潮的發生脈絡及社會底蘊，曾引發學界的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②。《行動的策略》則聚焦北京五四運動發生後，1919年5月7日至6月4日上海三罷（罷課、罷市、罷工）風潮的演進過程，探索從罷課到罷市過程中，東南集團裏的江蘇省教育會一派與官紳商各勢力、華洋兩界各層面人士的應對策略與運作手段，為即將出版的《協商的藝術：上海三罷始末（後篇）》所呈現的罷市七日的跌宕情節拉開序幕。

《行動的策略》聚焦於北京五四運動發生後，1919年5月7日至6月4日上海三罷風潮的演進過程，探索從罷課到罷市過程中，東南集團裏的江蘇省教育會一派與官紳商各勢力、華洋兩界各層面人士的應對策略與運作手段。

據作者分梳，上海學界三個系統親疏關係不同，抗爭目標與行動策略各異，在運動不同階段均有領導權競爭與各自內部糾葛拉扯的情況。而總罷課得以實現，則標誌着各系統意見在磋商協調後達成初步整合。

五四研究歷經百年，經周策縱、彭明等前輩學者論證，「因為有新思想，於是遂有『五四運動』」之說漸成研究定式^③，學生運動遂與新文化運動交織糾纏^④。此種論述足以貫通歷史敘述，卻亦簡化歷史變動情況。近年不斷有研究者嘗試從概念與史事各層面來審視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聯與區別，並以多元視角與論述方式勾勒各方力量在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中的言行作用，力圖展現歷史的複雜面貌^⑤。陳以愛是其中反思先行定說最力、並取得豐厚成果的研究者與探尋者。

繼在《動員的力量》中提出了五四研究「借助上海史及相關研究成果」的突破之道後^⑥，作者在《行動的策略》中更明確檢討五四研究的幾重障礙：一是「簡化版革命史敘事」改寫了親歷者的歷史記憶，框限了研究者對於商業史、社會史的理解認知；二是現代化敘事忽視了與現代化無直接關聯的人、事、物，低估了傳統家族制度與舊思想擁護者對於歷史的推動作用；三是北京大學新思潮、新文學被解釋為五四運動關鍵起源的說法，忽視了基督教青年會、留日學生等團體的角色；四是追求宏大敘事與理論，輕視歷史細節及其複雜萬變，輕視個體性情、才幹對於歷史的影響（頁44-46）。在此基礎上，作者憑其綿密考證功夫於不同史料中反覆研求，結合整體圖像與微觀細節，如探案小說般將上海五四運動高潮——三罷始末中各方力量的交互關係以及協作、分合所引發的社會

風潮，歷史演進與後來敘述中的隱微變化，以及江蘇省教育會中黃炎培、沈恩孚等人的精神氣質與思想特性於讀者眼前呈現，由此揭開上海五四運動關竅要處的種種謎團。

一 內容提要

《行動的策略》除前言和結論外，共分為三章。第一章「上海學界的分合協作」依時序勾勒從上海學界響應北京風潮，最終促成罷課的演進過程。自1919年5月4日起，北京學生為「外爭主權、內懲國賊」問題不斷推動罷課，終在19日促成罷課，其訴求亦因應局勢而更動，在「青島問題不簽字」，懲辦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國賊兩項的基礎上，增加了教育問題、學生自由問題、釋放被拘留日學生與恢復南北議和等四項（頁115-17）。為達成訴求，乃至推動政府改良政治，北京學生尚在醞釀全國一致罷課的大運動（頁148），上海學界的響應便變得尤為重要。只是上海地處華洋兩界，人物、團體眾多，加之有外地學生抵滬後組成的外來力量，因此對於罷課抗爭的方案、步驟與實施時間均莫衷一是。

據作者分梳，上海學界分為三個系統：一是江蘇省教育會及其相關機構（分處華界的中華職業教育社、上海縣教育會暨童子軍聯合會等，分處租界的寰球中國學生會、歐美同學會等）；二是5月11日新成立的上海學生聯合會（以下簡稱「上海學聯」），附設於寰球中國學生

會)，以及從上海學聯分離出去的滬北各校共同救國會；三是國民大會上海幹事部（由國民黨系留日學生救國團同其他民黨勢力結合而成），以及京津各地赴滬的學生團體（後來成為全國學生聯合會籌備處）（頁70-71）。三個系統親疏關係不同，抗爭目標與行動策略各異，在運動不同階段均有領導權競爭與各自內部糾葛拉扯的情況。而總罷課得以實現，則標誌着各系統意見在磋商協調後達成初步整合。由此，作者梳理上海學聯籌議罷課的始末過程——在與京津學生商討後，於5月15日籌議發動罷課，歷經22日暫緩罷課波折，最終於26日促成罷課，細緻展現了上海學界三個系統及其內部的動態關係，特別指出省教育會最初調停罷課，其後謹慎從旁輔導學生，發揮指引運動方向的關鍵作用。

第二章「上海紳商和公團政治」探討上海紳商的政治作用。上海學生罷課後，當地局勢因官方介入而日益緊張。隨着段錫朋等北京學生南下，促成商界罷市來實現罷免國賊成為在滬學生的共識。惟學生鼓譟罷市既逾越常軌，又與商家切身利益有悖，故阻礙良多。滬上商業團體首次呼應學生，公開提及「商界罷市」意向者，即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以下簡稱「商業公團」，頁426）。只是既往研究對商業公團的人事背景與政治聯繫缺乏系統考察，且有史實及判斷失誤。蓋商業公團屬複合結構，由同業公會、同鄉會及公所、商業研究等團體臨時聯盟而成（頁277、353-54），所涉人事繁瑣、組織複雜。

作者在本章挖掘傳記、年譜、家族宗譜、商業團體會議記錄等史料，討論商業公團的成立原委、組織結構及領導核心，並對滬上最具勢力的同鄉會組織作細緻爬梳。據作者考察，商業公團的領導核心以寧波同鄉會（與四明公所部分重合）、廣肇公所革新派為中心，成員有虞洽卿、鄒靜齋、湯節之、張讓三等人（頁345-53），兼及北洋政府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員楊晟等人士襄助。廣肇公所經1918年改組後，形成以溫宗堯為領袖，譚海秋、湯節之等為核心的領導力量，其在內政方面傾向西南護法政府及政學系，主張聯直反皖，推動南北議和；外交方面則主張聯美制日（頁265）。寧波同鄉會與四明公所中的人物，以虞洽卿最受矚目，1919年3月商業公團成立後成為首任會長（頁348）。作者挖掘出甬紳名儒張讓三偕同方樵苓、方椒伯等財資雄厚的鎮海方家人士，展現其在團結同鄉、扶植文教、倡導國貨、維持浙江局勢等方面的貢獻（頁273-77）。與甬商關係密切的紹興商人在滬經營銀錢業，作者着重探究紹興同鄉會中宋漢章、田時霖、曹慕管等人的社會關係與政治能量，儘管該會在政治上表現保守，但曹慕管等個別成員積極參加商業公團（頁306）。而對於此前人們知之甚少的楊晟，作者不僅呈現其生平事迹與政治資歷，探明其外交協調手段與對日戒備的政治旨趣（頁326-38），而且揭示楊晟借助鄒靜齋、沈卓吾等人培植發起商業公團和各類工商團體的抵制日貨運動（頁360-70）。

透過商業公團之例，作者意圖揭示：以旅滬紳商合作籌劃、進行政治參與為典型的「公團政治」，和政府官員與社會團體之間互為聲援且彼此融滲的官商連動，共同構成理解上海五四運動的基本前提。

「東南集團」是指以上海為活動舞台的社會精英，涉及政、商、學、報多界。「東南集團」的提出，不僅可以打通晚清史與民國史的隔閡，更可將經濟、文化、社會、新聞等專史領域冶於一爐，於整體性視野中探察集團中個體與群體的言行軌迹。

透過商業公團之例，作者意圖揭示：以旅滬紳商合作籌劃、進行政治參與為典型的「公團政治」，和政府官員與社會團體之間互為聲援且彼此融滲的官商連動，共同構理解上海五四運動的基本前提。

第三章「商學聯合的集體行動」講述上海罷市的實現與商會團體、同鄉組織的關聯。自5月26日上海學聯開始聯絡商界，至6月5日「同盟罷市」最終達成（頁556），此過程遷延數日，非學生宣傳籲請即可奏效。5日罷市由華界內的南市而起，再擴及英法租界以至滬北，這與南市商人呼應學生息息相關。由此，作者敏銳地發現「罷市原因亦非由學生觸動」（經亨頤語，頁389），而最終扭轉乾坤、推動罷市者，則為江蘇省教育會與南市的上海縣商會。

作者逐步揭開上海罷市起源的謎團。首先指明上海縣商會與上海地方自治機關存在相續相繫之關係，前者董事多為前自治機構董事或議員，故縣商會正副會長顧馨一、蘇筠尚等縣商會領袖同官、紳、學、報各界往來合作，且擔任江蘇省教育會會員，在關鍵時刻響應學界罷市號召（頁395-403）。其次依時序探討上海學聯推動罷市的過程：先是滬上各校學生聯絡同鄉商業團體，再由上海學聯於5月31日召開北大學生郭欽光（宣稱「被曹〔汝霖〕家用人打死」）的追悼會（頁465），會同京津各地的南下學生作罷市動員，會後更遊行至上海總商會、縣商會等處請願，活動持續幾日，終引發官廳介入，6月

4日學商兩界集會之地縣商會被淞滬警察廳解散接管。在罷市遇阻之際，北京學生發起「六三運動」（下詳）卻遭政府壓制的「津電」到滬，此消息於4日晚被上海學生印成傳單分發，並由學生跪地泣告商界，為形成罷市奠定輿論基礎。與此同時，作者揭示出省教育會的領導作用：先是與省教育會有聯繫的曹慕管、朱少屏聯絡商業公團督促罷市，再由省教育會暗中支持上海學聯發起5月31日的集會遊行活動（頁425-26、477-78）。局勢危難之際，省教育會聯合上海學聯、縣商會等十個團體為山東問題通電，並在6月4日縣商會被解散、正副會長雙雙辭職時，與縣商會等八個團體致電政府，要求集中於罷免費、陸、章一項（頁521-25），隨後由黃炎培出面統合商學各界意見，奠定「不罷國賊不開市」的行動方案，罷市遂於6月5日全面開啟（頁569）。

二 「東南集團」與「公團政治」

作者對於五四研究的突破，不僅在於開拓、展現上海三罷運動的具體細節與演進過程，一改此前重北京、輕上海的研究取向，還在於提出「東南集團」這一概念，使之成為統攝整個研究系列的關鍵詞與重審歷史演進的獨特角度。根據作者在《動員的力量》中的定義，「東南集團」是指以上海為活動舞台的社會精英，涉及政、商、學、報多界，其淵源起自清末戊戌維新及立

憲派，並在東南互保、辛亥革命、五四運動、聯省自治等重要歷史事件中擔任要角。五四時期的東南集團主要包括江蘇省教育會的張謇、黃炎培、沈恩孚，基督教青年會的余日章，寰球中國學生會的李登輝、朱少屏，華商紗廠聯合會的聶雲台、穆杼齋、穆藕初等人。該集團以士紳名流地位投入地方教育與實業建設，憑藉政、商、學、報各界協力運作的方式實現其對內和平統一、對外聯美制日的國家戰略構想。可見，「東南集團」的提出，不僅可以打通晚清史與民國史的隔閡，更可將經濟、文化、社會、新聞等專史領域冶於一爐，於整體性視野中探察集團中個體與群體的言行軌迹^⑦。

作者提煉「東南集團」這一概念，受多年反覆研讀的陳寅恪及邵循正著述中「集團」說的啟發^⑧，亦源於時人觀察、前人研究的提示與自身研究經驗的反思總結。東南集團人士在不同歷史時期頻繁登場，在各類團體組織中進行結合，以不同面貌發揮歷史作用；只是時人受限於知識背景與論述目的，觀察後得出的總結立論不一，因而以彼此相關卻有區別的名目將之命名。如張朋園討論晚清以張謇為中心的江蘇立憲派，將張謇與江浙各界有關人物所形成的「似無形而有形的團體」定為「江浙派」^⑨。鄧中夏將1920年代黃炎培一派稱為「諮議派」，蓋黃炎培、沈恩孚等人曾為清末江蘇省諮議局議員^⑩。惲逸群稱黃炎培、沈恩孚等為「江蘇省教育會派」或「職教派」^⑪。《行動的策略》開篇援引毛澤東的說法，則

稱黃炎培、袁希洛等教育界人士為「江蘇教育會派」(頁2)。

作者進入五四研究，亦源於對江蘇省教育會的關注。按其在《動員的力量》中自陳，之所以新取「東南集團」一詞作為統攝主題而非沿用省教育會，蓋因後者「難以概括這群社會精英的諸多活動，也不足顯示東南名流在晚清民國史上的長期作用」^⑫。以「東南集團」之名確可將東南名流除文教外的實業、經濟、政治活動網羅在內，卻亦需關注到東南名流不扞格於地域限制，向全國擴展的政治雄心及勢力版圖^⑬。事實上，省教育會與各方政治力量相互牽扯，尤其是與「北洋集團」(顯然在概念與所涉對象上與「東南集團」相對舉)之間存在緊密關聯^⑭，1920年後張謇父子汲汲於江蘇省長之席，黃炎培兩次被提名為北京政府教育總長，即為顯例^⑮。

因此，若是僅執著於概念上的名實辨別，反倒忽略了作者借「東南集團」概念重建社會精英的人際網絡與思想行動的意圖。如作者援引瞿宣穎所言，欲「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系淵源、師友親族的各種關係及其活動之事實經過」^⑯。作者探尋「東南集團」的世系淵源、親族關係，無疑成為理解東南(上海)社會結構的基礎；而透徹上海社會結構，反過來又可輔助完善歷史細節，補足材料之闕。可見，若以豐富史料建立社會網絡，逐步搭建理解社會的大概輪廓，有助於理解其中的殘餘斷片，

作者探尋「東南集團」的世系淵源、親族關係，無疑成為理解東南(上海)社會結構的基礎；而透徹上海社會結構，反過來又可輔助完善歷史細節，補足材料之闕。

作者提出「公團政治」之說，正是關注到構成「東南集團」網絡及其勢力的公團組織與聯合會。五四前後這些組織表達政治關切，對地方及中央政策施加輿論壓力，成為地方和中央之間的樞紐、溝通華洋意見的媒介。

盡可能克服歷史記載之不足。如上海罷市後，各同鄉團體、同業行會紛紛發布停業通告，要求政府罷免國賊，惟各大報章對相關人物隱晦其名，議決過程更是含混帶過（頁557、563）。在作者將滬上各商業團體的具體情況梳理明晰後，讀者方能窺測在罷市關鍵環節中商學各界的態度及前後原委。又如前面提到，顧馨一、蘇筠尚等在6月4日縣商會被解散後辭職，卻在當天應黃炎培之邀，同意聯絡商學各界一致行動並致電政府（頁519）。若無作者將縣商會與省教育會之淵源釐清，此舉實無法理解。這也是作者窮究多種史料，還原歷史細節的用意所在，亦是其肆力於學、苦心孤詣之表現。

可以發現，作者提出「東南集團」仍建基於對各組織、團體的具體爬梳。受陳寅恪影響以「集團」說分析中國近代史的邵循正，亦不忘倡導做「中間性層次」研究（關注商會、會館），可見社會群體研究或許正是推進集團研究的根本之道^⑩。作者在本書中適時提出「公團政治」之說，甚至冠以「上海政治」之名，正是關注到構成「東南集團」網絡及其勢力的公團組織與聯合會。五四前後同鄉團體、工商組織與法定團體以「公團」及「聯合會」名義表達政治關切，對地方及中央政策施加輿論壓力，成為地方和中央之間的樞紐、溝通華洋意見的媒介（頁372-73）。而江蘇省教育會偕各公團向政府致電籲請罷免國賊，挽救外交失敗，更成為促成罷市的標誌性事件。

以各省教育會、商會為主的法定團體與五四前後出現的學生聯合會、各界聯合會等社會團體具有重要社會影響，並逐步介入政治事務，被視為匯聚民意的重要組織，其集結而成的國民大會（會議）一度成為取代現實國會的政制選項^⑪。不過，誠如馮筱才對商人團體史研究的觀察，具體商業團體的「內部實態及其與外界政治勢力的關係」尚缺乏「細緻的研究」（頁247）。儘管近些年來研究有所推進，卻難言有重大突破，諸多團體組織仍舊底細不明。而作者在《動員的力量》中對於江蘇省教育會、基督教青年會、寰球中國學生會、上海學聯、復旦大學內部社團等的組織構造、人事班底、動員能力着力勾勒；在本書中對於商業公團、寧波同鄉會、廣肇公所、紹興同鄉會、上海縣商會等團體的一一梳理，無不為今後的公團研究與「公團政治」概念的闡發，奠定史事基礎與方法啟發。可知「中間性層次」尚需深入細節，並列考察；組織內部的運作機制、人事關係與代際延續、各組織間的互動關聯等問題，都是有待繼續突破的重點。

三 五四歷史的隱與顯

除對各色組織團體予以細緻挖掘外，作者尚為諸多生平不詳或是以往認知有誤的人物（涉及學、商、報各界）設立小傳，觀書中所記，計有楊晟、顧馨一、蘇筠尚、張讓三、鄒靜齋、湯節之諸人，這

些成果均可作為相關人物的研究指南。作者認為人物史和事件史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真正要把握住歷史進程，既需要對長時段社會經濟等結構性因素有所理解，也必須能進入歷史人物和事件的隱晦細節」（頁48）。作者的研究目的即還原歷史，因此在提出「東南集團」等結構性概念的同時，亦描繪遠近明暗兼備的歷史圖像，於細微之處進行挖掘考釋，隱秘之處予以揭示分析，矛盾之處着力考辨澄清，曖昧之處加以推敲分辨，構成了作者迥異時流的研究特色，彰顯其學術素養與品味。

不過，透過細節揭開歷史進程的隱微變化，誠非易事，因微彰隱顯不僅涉及歷史進程，也反映在歷史書寫之中。若要達至作者開篇曾引用的《周易·繫辭下》「君子知微知彰」的境界，無不考驗着歷史研究者的功力、見識與反思意識。

在本書中，作者抉發歷史隱秘曖昧之處、豐富讀者歷史智識之例，不勝枚舉，在此僅列最具創見、填補空白的幾處予以闡發。一是有力揭示出江蘇省教育會在罷課罷市風潮中的樞軸作用。作者認為，受限於五四期間省教育會對報界施加影響，致使關鍵時刻該會行動鮮見報端或被模糊處理，加之1927、1949年兩次歷史鉅變，使五四敘事中該會人物的作用與面目受到剝離性處理及塗抹性重述；更因該會人物秉持「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的為人處世風格，致其敘事於私人領域流傳而與主流論述相抗，種種因素使該會人物在五四運動中的事功不彰，未得清晰認識。

根據作者梳理可知，自5月7日黃炎培擔任國民大會臨時主席起，省教育會一直從旁影響學生運動的進退，黃炎培先是勸說上海學聯將罷課期限延後，確定實施罷課後則在背後掌舵，為26日學生罷課協調上海公共體育場作集會場地，並聯絡警廳方面為學生擔保；在31日罷市動員大會則暗中派遣教師維持秩序，再由曹慕管、朱少屏聯絡商業公團督促罷市；最終在6月5日出面，一舉促成商學各界一致行動。由此凸顯省教育會因勢利導、顯隱從容、以柔制剛的進退策略與行事理念，而黃炎培被作者許為「政治務實主義者」（頁579）。

二是勾勒出南北各界政治訴求的變動。共同的政治訴求促成一致行動，最終實現上海罷市的重要因素即上海各界集矢於懲辦國賊這一清晰目標。然而上海學生罷課後，其政治目標雖順應北京學生所提出的六項訴求，持激進或保守的不同立場的學生間、各團體間，訴求又各有側重，尤其是對「國賊」定義看法各異。上海官民各界政治訴求從分歧趨於統一的歷程，既折射出各方通過溝通協商、逐步與北京當局達成共識的複雜博弈，亦是五四運動中政治抗爭的核心內容之一，惟先行研究對此缺乏關注。通過細密勾勒5月25日後的歷史軌迹，作者清晰呈現出上海各界的訴求演化：逐步摒棄分散主張，轉而聚焦於以商界罷市方式迫使政府罷免國賊。由此，作者指出，江蘇省教育會等團體對於推動各界凝聚共識、確立統一行動目標，起到了關鍵作用。

作者清晰呈現出上海各界的訴求演化：逐步摒棄分散主張，轉而聚焦於以商界罷市方式迫使政府罷免國賊，由此指出，江蘇省教育會等團體對於推動各界凝聚共識、確立統一行動目標，起到了關鍵作用。

作者憑藉其對五四南北局勢的熟稔、對史料的深度搜求，認為「六三運動」是京滬學生的預謀，而不是被動的偶發事件。這一新見可以說是五四研究領域的重要發現之一。

三是揭示「六三運動」的真正緣起。學界對於「六三運動」發動一事缺乏系統探討，且認為運動是北京學生受政府壓迫而被動發起，未能揭示京滬學界聯動這一真正緣由。作者憑藉其對五四南北局勢的熟稔、對史料的深度搜求，認為「六三運動」是京滬學生的預謀，而不是被動的偶發事件。此前北京學生為了「擴大運動」，已「遣派代表到上海」相機發難（頁436-37），其後以北京學生為前鋒，恢復遊街演說，在活動於6月3日被政府壓制後（頁540-41、544），津滬各埠繼起響應；而上海為全域勝敗所繫，北京學生被捕的消息於4日抵達滬上，隨即激起5日上海罷市（頁532）。這一論斷可謂洞見，亦與筆者的觀察相合。早在5月30日，北京學生聯合會已決議恢復講演，並在31日以售賣國貨的形式舉辦活動，在得知「上海有罷市之動機，各地亦作洛鐘之響應」後，於6月3日外出講演，隨即激起上海風潮¹⁹。京滬學生聯動發起「六三運動」這一新見，可以說是五四研究領域的重要發現之一，無疑將深化學界對五四運動學生策略與整體格局的認知。

四是呈現出歷史的運轉邏輯與難言之隱。如作者所言，每個時代均有其「獨特禁忌和難言之隱」（頁57），體現在歷史現場與事後論述中，成為追蹤歷史的難點，卻是把握時代的鎖鑰。只是隨着人事代謝、風俗改易、史料埋沒，回歸現場、揭開秘密、洞察隱情皆非易事。作者卻擅長於單詞片語中識得整體，細微之處歸納規律，行文處將諸多治史要訣予以闡發，總有撥雲見霧

之感，為後學提供穿梭史料叢林的方法指引。如本書在探究報刊史時辨析中外報館之複雜背景，認為「華報所引『外論』，有時包括華人見解；而西報所謂『華論』，卻可能含外人意見」（頁220）。因關注到《新聞報》經理汪漢溪與上海紳商的關係，作者指出《新聞報》對華界商人中下層消息最為靈通，但凡關乎上海縣商會的消息，自應特別注意該報（頁407）。探討商業史時，作者則關注商業組織中的書記秘書角色，認為「這類坐辦型人物，較掛名而不管事的董事會，有時更有實質影響力」（頁249）。據此，曾擔任上海總商會坐辦的楊蔭杭，其以「老圃」為筆名在《申報》的論說，尤其是關乎商業的內容，自有其植根於親身經驗的立論依據與明確的現實指向（頁564）。另外，依據紹興同鄉會發起徵求會員活動中的分隊與編制資料，可用以還原各隊員的社會網絡（頁306-309）。這些經驗之談均有助於相關領域學者對史料鑒別印證，融會貫通，更好運用。

四 小結

陳以愛出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研究起點是從遼耀東先生治學術文化史，徜徉於王國維、陳寅恪等先賢研究²⁰；進入五四領域後感慨於議題之廣闊，力圖拓寬研究方法與史料閱讀的邊界，從時間、地域、人物三方面擴充觀察歷史的尺度²¹，遊走於政治、商業、教育、社會各領域間，為五四研究開闢新

境。未料在研求東南集團張謇諸人時，再次與遼先生相遇——遼先生〈辛亥革命前後張謇的轉變〉一文剖析張謇從清末立憲派領袖轉向支持共和政體的原因，被曾任新亞書院校董的沈燕謀轉致張謇好友趙鳳昌之子趙叔雍，繼而引發後者關於「通儒能因時制宜」的千言解說。作者在本書的結論部分引述沈燕謀日記關於這段往事的記載（頁573-74），讓人不得不慨歎學術之傳承、人事之因緣。

《行動的策略》一如此前的《動員的力量》，所涉主題人物紛繁複雜，在訂疑考誤之外又揭示了諸多重要議題，並提供解答線索，如傳統家族組織對於社會改良與國家變革的作用，政、商、學、報等不同界別團體的組織關係與動員機制，士紳團體關於建構現代國家的方案，等等。作者窮一己之力，應對上述難題，實為巨大挑戰。因此，一些史實細節上略有微瑕亦屬難免，如〈上海學生聯合會議決罷課問之商榷〉處名「太倉一粟」，係俞劍華的筆名，而非「作者不詳」（頁161）；北大學生狄膺的室友是傅斯年、顧頡剛，而無羅家倫（頁464）；1919年胡適赴滬迎接杜威（John Dewey）來華，返京時間為5月12日，而非10日（頁115）^②。此外，6月初上海學聯關於是否承認南北政府、新舊國會一事所涉的內部分歧（上海學聯評議部與執行部、東吳大學法科生與復旦大學學生），以及學生的政治立場與黨派間的牽連，尚可再作細化研究（頁441-54）。

可見，未來五四研究的新進展，自需於細節處推敲落實，方能

撬動或補足宏觀敘事。羅志田曾指出，「其實對那場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經過及其參與者、反對者和旁觀者的言與行，我們的了解還不能說充足」^③。事實上，五四所牽涉的地域、群體、組織紛雜，又與南北議和、巴黎和會等國內外要事緊密相關，更需以宏觀視野將其細節逐一梳理，纖毫畢現，並一網打盡。而作者廣求史料、系統閱讀、從細節突破的方法兼及整體性的宏觀視野，對於釐清史事，揭開迷霧足資鑒鑒。更重要的是，五四研究（乃至歷史研究）需要學者間相互信任，通力合作，以專書乃至書系形式的系統研究呈現，方能逐步突破，積薪居上。可以確認的是，本書已作出了極佳的示範，將五四研究推向一個新高度，無疑會成為日後研究無法繞過的標竿。

《行動的策略》所涉主題人物紛繁複雜，在訂疑考誤之外又揭示了諸多重要議題，並提供解答線索。作者廣求史料、系統閱讀、從細節突破的方法兼及整體性的宏觀視野，將五四研究推向一個新高度。

註釋

① 陶孟和：〈現代教育界的特色〉，《現代評論》，第一週年紀念增刊（1926年1月1日），頁31。

② 相關書評，參見王東杰：〈王東杰評《動員的力量》|上海與五四，再到近代中國〉（2023年1月18日），澎湃新聞網，<https://m.thepaper.cn/detail/21570651>；李瑞贊：〈李瑞贊評《動員的力量》|五四運動何以在上海引發轟動？〉（2022年6月18日），澎湃新聞網，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538494。講座研討的報導，參見趙帥整理：〈講座|在上海發現「五四」與另起的「新文化運動」(上)〉（2022年5月4日），「澎湃私家歷史」微信公眾號，https://mp.weixin.qq.com/s/INW7e3_7cOVnAg2AYJJJIQ；〈講座|在上海發現

「五四」與另起的「新文化運動」(下)》(2022年5月7日)。「澎湃私家歷史」微信公眾號, https://mp.weixin.qq.com/s/_ESRh1chg7hKpQk8h2hXVw。

③ 仲九：〈五四運動的回顧〉，《建設》，第1卷第3號(1919年10月)，頁601。

④ 周策縱著，陳永明等譯：《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頁2-6；彭明：《五四運動史》，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255-61。

⑤ 楊琥：〈序〉，載楊琥編：《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時期名人談五四(1919-1949)》(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頁1-5；桑兵：〈「新文化運動」的緣起〉，《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4期，頁5-19；周月峰：〈五四後「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頁28-47，等等。

⑥⑦⑧⑩⑫ 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香港：開源書局出版有限公司；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1)，頁10-11；1-5、31-32；1-2；16；11。

⑨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頁174。

⑩ 中夏(鄧中夏)：〈北遊雜記(六)〉，《中國青年》，第1卷第18期(1924年2月16日)，頁14-15。

⑪ 惲逸群：〈黃炎培論〉，載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惲逸群文集》編選組：《惲逸群文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頁205-209。

⑬ 鄧中夏認為黃炎培一派的「秘訣」為「是實力，即承認」、「棄虛名，居實權」、「對各方，不開罪」。參見中夏：〈北遊雜記(六)〉，頁15。

⑭ 陳以愛：《動員的力量》，頁4-5、60-61。以「北洋集團」這一概念來統攝北洋系(派)，亦屬晚出用法，更何況「北洋系」本身便

經歷了系譜化的過程，其內涵外延伴隨着所囊括人士、派系的增加而泛化。參見桑兵：〈「北洋軍閥」詞語再檢討與民國北京政府〉，《學術研究》，2014年第9期，頁106-14。

⑮ 惲逸群：〈黃炎培論〉，頁205-206；靳帥：〈蘇社集團的分裂：張謇父子、江蘇省教育會與1921年省議長之爭〉，《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1年第12期，頁88-102。

⑯ 陳以愛：《動員的力量》，頁4；翟兌之：〈翟序〉，載徐一士著，孫安邦點校：《一士類稿》(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頁9。

⑰ 章開沅：《凡人瑣事：我的回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頁324；陳以愛：《動員的力量》，頁1-2。

⑱ 徐佳貴：〈法團與民治——1922年八團體國是會議新探〉，《史林》，2024年第3期，頁164。

⑲ 參見趙帥：〈走向「運動時代」：五四期間北京學生與各界的會合運動〉(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24)。

⑳ 呂芳上：〈從「東南集團」視角重探五四運動——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序〉，載陳以愛：《動員的力量》，頁VI。

㉑ 參見〈胡適致蔡元培函〉(1919年6月22日)，載潘光哲主編：《胡適中文書信集》，第一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頁364。此承歐陽哲生教授提示，謹致謝忱。亦參見宋廣波：《胡適年譜長編》，第二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頁107。

㉒ 羅志田：〈體相和個性：以五四為標識的新文化運動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3期，頁27。

趙帥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博雅博士後